

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

日译文卷（日本外交文书）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

日译文卷（日本外交文

路遥 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 日译文卷. 日本外交文书/路遥主编.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7-5607-4206-9

I. ①义…

II. ①路…

III. ①义和团运动—史料

IV. ①K256.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7778 号

ISBN 978-7-5607-4206-9



责任编辑 陈海军

美术编辑 张 荔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250100)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规 格 787×1092 毫米

印 张 237.5

字 数 547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全八册) 1380.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审者 王晓秋 宋成有

本卷译者 杨宁一 曹雯 陈涛

戴逸

邹爱莲 孟超 徐兆仁

成崇德 李文海 陈桦

马大正 于沛 朱诚如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戴 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国家批准建议纂修清史之报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组成之领导小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十四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推动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藉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历史规律。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水涸则鱼逝，气盈则鸟飞。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上，不能构建于虚无飘渺之中。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均为清史编纂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国素称诗书礼义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栋，尤以清代为盛。盖清代统治较久，文化发达，学士才人，比肩相望，传世之经籍史乘、诸子百家、文字声韵、目录金石、书画艺术、诗文小说，远轶前朝，积贮文献之多，如恒河沙

数,不可胜计。昔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江陵,西魏军攻掠,悉燔于火,人谓丧失天下典籍之半数,是五世纪时中国书籍总数尚不甚多。宋代印刷术推广,载籍日众,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难窥其涯涘矣。《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种,人议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增补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超过原志著录之数。彭国栋亦重修《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书一万八千零五十九种。近年王绍曾更求详备,致力十余年,遍览群籍,手抄目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书至五万四千八百八十种,超过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书之全豹。王绍曾先生言:“余等未见书目尚多,即已见之目,因工作粗疏,未尽钩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书籍总数若干,至今尚未能确知。

清代不仅书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档案留存于世。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而清朝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档案,秘藏内廷,尚称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档案,多达二千万件。档案为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于当事人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具有较高之真实性、可靠性。大量档案之留存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俾历史学家得以运用第一手资料追踪往事,了解历史真相。

二曰乱。清代以前之典籍,经历代学者整理、研究,对其数量、类别、版本、流传、收藏、真伪及价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清理、甄别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销毁所谓“悖逆”、“违碍”书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时经师大儒,联袂入馆,勤力校理,尽瘁编务。政府亦投入巨资以修明文治,故所获成果甚丰。对收录之三千多种书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种存目书撰写详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内容要旨,述其体例篇章,论其学术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编成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洵为读书之典要、后学之津梁。乾隆以后,至于清末,文字之狱渐戢,印刷之术益精,故而人竞著述,家姻诗文,各握灵蛇之珠,众怀昆冈之璧,千舸齐发,万木争荣,学风大盛,典籍之积累远迈从前。惟晚清以来,外强侵袭,干戈四起,国家多难,人民离散,未能投入力量对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档案,深藏中秘,更无由一见。故不仅不知存世清代文献档案之总数,即书籍分类如何变通、版本度藏应否标明,加以部居舛误,界划难清,亥豕鲁鱼,订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尘封,行将渐灭。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与坊间劣本混淆杂陈。我国自有典籍以来,其繁杂混乱未有甚于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献、档案,非常分散,分别度藏于中央与地方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学研究机构与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级之档案言,除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一千万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档案在战争时期流离

播迁,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沈阳辽宁省档案馆之圣训、玉牒、满文老档、黑图档等,藏于大连市档案馆之内务府档案,藏于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之题本、奏折、录副奏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档案文书,损毁极大,但尚有劫后残余,璞玉浑金,含章蕴秀,数量颇丰,价值亦高。如河北获鹿县档案、吉林省边务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河南巡抚藩司衙门档案、湖南安化县永历帝与吴三桂档案、四川巴县与南部县档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鱼鳞册、徽州契约文书、内蒙古各盟旗蒙文档案、广东粤海关档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档案、西藏噶厦政府藏文档案等等分别藏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亦称《叶名琛档案》),英法联军时遭抢掠西运,今藏于英国伦敦。

清代流传下之稿本、抄本,数量丰富,因其从未刻印,弥足珍贵,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张謇、赵凤昌之家藏资料。至于清代之诗文集、尺牘、家谱、日记、笔记、方志、碑刻等品类繁多,数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及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不少贮存。丰城之剑气腾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寻访必有所获。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苏州、常熟两地图书馆、博物馆中,得见所存稿本、抄本之目录,即有数百种之多。

某些书籍,在中国大陆已甚稀少,在海外反能见到,如太平天国之文书。当年在太平军区域内,为通行之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毁,现在已难见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竞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世界各地图书馆中保存之太平天国文书较多。二十世纪,向达、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寻觅太平天国文献,收获甚丰。

四曰新。清代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之过渡阶段,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之中,产生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携来自自然科学、艺术和西方宗教知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曾收录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仪》,熊三拔《泰西水法》、《简平仪说》等书。迄至晚清,中国力图自强,学习西方,翻译各类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声光化电之书,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纾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艺小说。中学西学,摩荡激励,旧学新学,斗妍争胜,知识剧增,推陈出新,晚清典籍多别开生面、石破天惊之论,数千年来所未见,饱学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国传统之知识框架,书籍之内容、形式,超经史子集之范围,越子曰诗云之牢笼,发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变化,出现众多新类目、新体例、新内容。

清朝实现国家之大统一,组成中国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现以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傣文、彝文书写之文书,构成清代文献之组成部分,使得清

代文献、档案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绚丽多彩。

清代之文献、档案为我国珍贵之历史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庞大、品类之多样、涵盖之宽广、内容之丰富在全世界之文献、档案宝库中实属罕见。正因其具有多、乱、散、新之特点,故必须投入巨大之人力、财力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吾侪因编纂清史之需,贾其余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装网络,设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贮存、检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侪汲深绠短,蚁衔蚊负,力薄难任,望洋兴叹,未能做更大规模之工作。观历代文献档案,频遭浩劫,水火兵虫,纷至沓来,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为浩叹。切望后来之政府学人重视保护文献档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卷帙长存,瑰宝永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献档案得以流传永远,沾溉将来,是所愿也。

《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序言

路 遥

我国史学界系统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始于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所谓“中国近代史”，其概念最初系指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至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这一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后来史学界将其下限延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即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也纳入“近代史”范畴之内。“中国近代史”被作为一个重点学科来研究，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正式兴起。它以民族解放斗争结合社会阶级斗争作为主流，义和团运动即其中重大事件之一。

一九五〇年为义和团运动五十周年，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主持编辑了《义和团》资料四册，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最早出版的一种。翦老在该资料集“序言”中说：“清算帝国主义血账，是纪念义和团的最好方法，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书的动机。”这就是当时编辑这部资料集之指导思想，对义和团研究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史学研究领域（也包括义和团研究）陷入了非正常状态。迨至七十年代“四人帮”被粉碎，学术界开始拨乱反正，义和团研究又步入正轨。从八十年代开始，由于中外学术交流沟通，义和团研究才开始面向世界。一九八〇年十月，山东大学等五个单位联合发起在济南举办了“义和团运动学术讨论会”，共一百二十多人出席，其中有美、日、加、澳等国十位学者参加，这是义和团研究第一次具有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常务机构设在山东大学。隔了十年，至一九九〇年，山东大学又联合中国史学会、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等六个单位，再次在济南举办了“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共一百三十多人出席，其中有日、美、法、德、匈、波等国二十五位学者。再隔十年，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又一次由山东大学联合中国史学会、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等八个单位，仍在济南举办了“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代表近一百五十人出席，其中来自日、美、英、法、德、澳、韩、以色列等国及中国

香港、台湾地区等二十八位学者。通过前后三次义和团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与讨论,对义和团研究有重大的推动。在这二十年内,无论中、日或美、欧,都相继有一些代表性的论著和资料出现,其成绩毋庸置疑。尽管如此,但由于义和团运动具有浓厚神秘性及其现象之复杂性,又由于文献资料之严重阙失,致使义和团研究中有不少重要问题难以突破,甚至停滞不前。其主要难题,有以下几点:

一、以往研究习惯于阶级斗争(包括民族斗争)的考察,着重于性质的论述,并满足于研究方法上的线性分析。从八十年代开始,研究者已不满足于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要求扩大视野,进一步从剖析社会结构着手。一九八六年在天津由南开大学等单位举办的“义和团学术讨论会”(国内),就已有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出现,但那时还是着重于对社会经济基础的探索。从社会结构或经济基础层面去探讨这场运动的成因,是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人类历史是具有社会的历史,有社会存在是人类的特征,而人类社会又是以众多群体及其组织为主干,并以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地理等各种要素为其有机构成。所以从社会结构入手乃是深入研究义和团的有效方法,它实是采取历史学同社会人类学相结合,而被称为历史社会学或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二、利用“矛盾论”——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理论,以考察这场运动中所体现出来之义和团、清政府与外来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当是可以继续遵循的研究方法。但其不足之处,在于更多研究者仍习惯于从矛盾各方之对抗、斗争,而不从或少从各方之相互制约的发展过程中去作具体而深入分析,把一场极其复杂的历史运动直线化、单一化了,因而也就很难有什么规律性的探索。即以近代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矛盾而言,民族矛盾当然是最主要的,而它怎样同社会矛盾相交织而促进了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发展;义和团运动同时期,国内曾爆发过几次规模较大的下层群众反抗斗争,它对义和团运动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至今还未见有分量的论著出现。

三、义和团运动的产生从其历史条件看,主要是因德国侵占胶州湾出现民族危机而激发,同时也是反洋教、反教会斗争之延续与发展;而义和团之反教会斗争,又是同长期之民教矛盾密切关联。民教矛盾从西方宗教一方说,起主导作用的是教会及其传教士。义和团爆发于山东、直隶地区,在这些地区传教的天主教组织,有方济各会、圣言会、遣使会、直隶东南耶稣会与江南耶稣会等。这些修会在义和团运动地区原设有众多堂口,均受总铎区或主教代牧区领导。不同修会所采取的传教方针有什么异同?它吸收教民的手段有哪些特征?各修会同其所在国家的政治关系如何?这些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

尤其当民教矛盾尖锐爆发后,传教士同主教之间、主教同驻华公使、领事之间都有许多公文往来,教会内部更有大量通讯报道。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曾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整理过《教案教务档》,从中已不难看到大量民教矛盾都因民事、刑事纠纷而涉及司法权以及其他的相关资源问题。在各教会内部对此更有不少档案记录,却至今未有任何披露,这是导致“教案”研究难于推进的主要原因。

四、从思想意识方面看,围绕义和团运动暴露了中西方之间在思想文化与宗教信仰之间的重大差异。但不少研究者多习惯于从中西文化差异、冲突去论述义和团与教会之间的矛盾,而很少从基督教会将上帝信仰移植异境时应怎样同乡土文化、民间习俗相调适以化解矛盾这个视角入手,对此西方教会根本不予考虑。义和团运动的主体是中国下层民众的运动,应该考虑到这场运动的中国下层民众意识与民间信仰。所谓“民众意识”,是指特定时期在下层民众中间流行的日常各种意识;所谓“民间信仰”,是指其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而刻印于民众心理结构中的信仰与仪式。就教会一方说,无论其在民间传播或使教民皈依,都莫不以精神征服为指引,其遭到乡土文化抵制与民间信仰对抗乃势所必然。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梵蒂冈曾召开了第二届大公会议,制定、发表了许多文献,对以往传教也有过若干反思与检讨。以之联系义和团运动时期,应如何评价教会的对华传教方针及其所形成的民教矛盾,却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以上仅就我们思虑所及,提出几个问题,并非全面。现所汇编的这套中外文献资料,也可以说是应对于上述研究困境而编辑的。

编辑这套资料也是我多年所愿望,记得一九九〇年十月在济南举行“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之际,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同志曾约我商谈,建议由我主持编辑一套大型的《义和团运动资料汇编》。其途径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集中已出版的零散资料,二是搜索在各地的文献。基于当时条件,我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于负起此重担,但我对此事一直萦回脑际。二〇〇二年国家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二〇〇四年编委会抛出基础工程项目,本课题《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戴逸主任大力支持而获得批准,终于实现了我的夙愿。现在这套资料同以往相比较,它涉及面广,有些从海外搜求来,因受经济条件限制,还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要求,但它会给研究者以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拿义和团运动同中国近代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相比,它的神秘性与复杂性远超过其他。义和团运动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在中国社会危机之外又多出了民族危机,世界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对亚非地区的征服也已开始转向帝国主义扩张阶段;在中国是两个危机交织在一起,而义

和团运动又是中国具有乡土文化、信仰的下层群众所自发的一场反抗斗争运动,其所映现出神秘而诡异的特征乃不可避免。仅从现象上看,义和团运动恰似一面多棱镜,从不同侧面观察,各有其不同特征,但这不等于它没有正面的形象和本质的构成,研究者可以从《汇编》中作各自探析。我们除大量摘录当时中文报刊外,还选译了日、英、法、德等不同语种的文献资料。本《汇编》共分五卷八册,其中:中文资料一卷二册,英、日译文各一卷二册,法、德译文各一卷一册,共计五百四十七万字。其来源主要如下:

一、外国的官方文档,如日本外务省和参谋本部文件,涉及日本对华政策以及出兵参与联军共同侵华过程的相当详细记录。

二、西方的天主教内部文献,主要有德国圣言会和法国耶稣会对华传教活动与民教矛盾频发的记载。

三、侵略方的国内舆论,选德、法两国国内有关报刊的评述。

四、选自基督教传教士和西方学者的最早或较早撰述义和团的论著。

以上大部分记述来自与义和团不同的立场,有许多诬蔑义和团为“匪”、“拳匪”、“团匪”等词句,均非我们所认可,为要保持资料之原始性,一概不予改动,它涉及义和团运动诸多方面问题,仍有重要参考价值。限于我们水平,所选译内容与编辑方法当有许多不足之处,尚望研究者、专家批评指正!

二〇一〇年五月

翻译说明

一、原书为日本外务省编纂的《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北清事变(上卷)》，日本岩南堂书店1956年出版，2003年出版第三版。原书分九部分，现翻译一至五部分。

二、原本中以日文汉字记述的人名、地名、官职、军队、军舰名称等名词，尽量保持原貌；以片假名记述的西文名词，尽量采用已有约定俗成的中文译名，若查不出来则采取音译或保留片假名。

三、原文中用日本纪年和公元纪年，翻译时均以阿拉伯数字表示；以中国清朝纪年则用中文小写表示。

四、原文中对中国的称谓有“清国”、“中国”、“支那”三种，含义略有不同，尽量保持原貌。原文中“扬子江”、“长江”称谓都有，现一致改为“长江”。日文汉字“居留地”，一律改为“租界”。日文的“哩”一律译为“英里”。

五、日本外交文件在当时对欧美国家有“外相”、“次官”之称。现按词典规定：凡属民主共和政体的，如法国则译为“外交部长”，其次官则称“副部长”；而对英、德、俄、意、比、奥之君主立宪制或国王制的，则译为“外交大臣”，其次官为“副大臣”；对美国则译“国务卿”；而对日本自己，称“外相”或“外务大臣”均有之，至其次官，均保持原样。

六、本书原文称欧美国家出兵之军官衔，“校”级曾写有“大佐”、“中佐”、“少佐”，现译为“上校”、“中校”、“少校”；“尉”级，称欧美(除俄、奥外)军官为“大尉”者，均改译为“上尉”。

七、日本外务大臣如青木周藏曾封“子爵”，其爵位应放姓名前，如“外务大臣子爵青木周藏阁下”；又如驻华公使西德二郎、驻英特命全权公使林董均封过男爵，爵位应放在姓名之前。“小田切总领事”应译为“小田切代理总领事”。

八、本卷第一至二七五条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曹雯译；第二七六至二九一条略；第二九二至七二〇条由北京师范大学杨宁一、陈涛译。

日本外交文书

第 33 卷别册 1

(1900. 3~12)

北清事变(上)

日本外务省编纂
国际连合协会发行

目 录

事项一 各地团匪暴动状况报告.....	(1)
(一)北清状况.....	(1)
(二)满洲状况	(65)
(三)沿江一带状况	(72)
(四)南海状况(浙江省).....	(128)
(五)南海状况(福建省).....	(174)
事项二 对匪协同行动及各国之态度.....	(205)
事项三 维持南清秩序协定.....	(303)
事项四 北清警备及日本出兵.....	(329)
事项五 北清之战斗.....	(394)
后 记.....	(462)

事项一

各地团匪暴动状况报告

(一)北清状况

—

3月6日 驻清国西公使致青木外务大臣函
为报告骚扰状况等项事

附记：明治32年12月8日西公使电报

关于山东暴动驻清美、德、法公使与总理衙门交涉件
本机第一二号，3月29日收
外务大臣子爵青木周藏阁下：

杂 报

德国计划自胶州湾向山东内地铺设铁路以来，胶州附近高密地区有数千民众聚集起来，试图抵抗这一计划的实施。因当地民众有加害德铁路技师的举动，德国准备自胶州湾往该地派遣若干军队。后据山东巡抚袁世凯力称，以自己之兵力足以镇压，德国遂停止派兵。

山东义和团暴动渐次蔓延，直隶省内保定府所属新城县内，亦有团民骚动的状况出现，地方官已派出兵员前往镇压。又伴随山东省义和团暴动的蔓延，外国人往往成为受害对象。目前，受害对象不仅仅局限于英国籍传教士，其他如美国、德国及法国等传教士亦遭受种种袭击。前几日，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等五国公使，已联合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为保护外国人的生命以及财产，应对义和团实施镇压。

据报，数日前于云南省腾越附近，即邻近清国与缅甸之边境处，英军与清兵发生冲突（其原因为，就划定清缅边境线一事，英国委员与清国地方官间之纷争日趋激化，以至有此局面）。结果，英军烧毁茨竹、派籛二处寨堡，并杀害该处民众及驻守清兵等八十人。

以上为报告内容。敬具

明治33年3月6日 特命全权公使男爵 西德二郎（印）

（附记）

明治32年12月8日驻清国公使西电报

关于山东省暴动驻清美、德、法公使与总理衙门交涉件

明治 32 年 12 月 8 日上午 8:40 发,同日下午 1:35 收

驻清全权公使 西

第一八八号

近来,耶稣教教徒与当地清国人间之纠纷连续不断,遂相继引发山东省各地排斥耶稣教的暴动。于此,美、德、法等三国公使已联手向总理衙门施压。结果,山东巡抚被召回北京,同时命袁世凯暂署山东巡抚。

二

4 月 10 日 驻清国西公使致青木外务大臣函(电报)

为报告关于直隶省内骚扰事

4 月 10 日发,4 月 10 日收

驻清全权公使 西

第一五号(抄)

有若干匪徒北上至天津及北京挑起叛乱。然而,尚没有迹象表明将爆发更为严重的骚乱。

三

4 月 26 日 驻清国西公使致青木外务大臣函(电报)

为报告安庆附近暴徒、教民间之争斗情况事

4 月 26 日下午 5:12 发,同日下午 10:05 收

驻清全权公使 西

第一八号

前日,于安庆南十五华里处,暴徒与清国天主教教徒间爆发争斗。据传,有七十名暴徒被杀,而教徒一方却死伤甚少。然而,此次事件似乎并未引起重视。

四

4 月 26 日 驻清国西公使致青木外务大臣函

为报告保定府附近之争斗、清驻俄公使动态及其他事

本公第三七号,5 月 11 日收

外务大臣子爵青木周藏阁下:

杂 报

距保定府南十五华里之江家庄村,向来天主教教徒众多。前日,有义和团多人袭击该村。因该村已预先探知此事,是以村民多早早伏于房顶及窗间,以短枪进行防御。据传,此次冲突中,义和团团民死伤甚众,死者多达七十人左右,而该村村民仅死一名,伤六名。获上述消息后,地方官迅速派军前往镇压。双方见官军到来,立时各自散去,局面复归于平稳。据说,此后保定附近平静无事。本官以为上述义和团与天主教徒间的争斗尚为数不多,不足以引起特别重视。观察目前的状况,虽然难保其中没有讹传之嫌,仍电告之,以资参考。

数日前,总理衙门对外宣布,原总理衙门大臣桂春将出任驻俄国公使。